

# 白敏中收复三州七关说考辨

黄 楼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正月,吐蕃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萧关等七州归还唐朝。但是唐末康骈《剧谈录》卷上“李朱崖知白令公”条却载宰相白敏中率兵大破吐蕃,收复三州七关。《剧谈录》所记不见于两《唐书》、《通鉴》,被视为小说家言,历来不被重视。近年来,牛致功先生独创新说,在《有关白敏中的几个问题——读〈白敏中墓志铭〉》一文中引据《白敏中墓志铭》<sup>①</sup>等碑石材料,认为白敏中收复三州七关之说基本可信<sup>②</sup>。那么,白敏中是否曾统兵收复三州七关,如实有其事,如此重大事件,何以两《唐书》、《通鉴》等皆无片语提及,若无其事,又何以解释《剧谈录》中的相关记载?本文拟以《剧谈录》为中心,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剧谈录》撰者康骈,僖宗乾符五年(878)进士<sup>③</sup>,是书成于昭宗乾宁二年(895),篇首康骈自序云“咸通中始随乡赋……爰及窃名,殆将一纪。其间退黜羁寓,旅乎秦甸洛师,新见异闻,常思纪述,或得史官残事,聚于竹素之间”<sup>④</sup>,其内容主要是康骈在懿宗咸通年间所搜集的“新见异闻”,绝大多数是鬼神灵应故事,也有少数篇目为公卿将相的闲状逸事,《四库总目提要》评价是书“半出传闻,真伪互陈”,可信度不是很高。“李朱崖知白令公”条另见于《太平广记》卷170,题作“李德裕”,事实上,《广记》所拟标题不确,本条主人公并非李德裕,而是白敏中。又本条所记有三事,第一事为白敏中早年困蹇时被李德裕奖擢;第二事为白敏中大战吐蕃,收复三州七关;第三事为白敏中凯旋后同列宰相进诗

---

① 《白敏中墓志》,见《唐代墓志汇编》咸通〇〇五;吴纲《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白敏中神道碑》录文见孙芬慧《渭南发现唐〈白敏中神道碑〉》,《碑林集刊》第10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另参孙芬慧《白敏中神道碑与历史记载》,《兰台世界》2005年11期。

② 牛致功《有关白敏中的几个问题——读〈白敏中墓志铭〉》,载《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171页。

③ 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6~947页。

④ 《剧谈录》卷上,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自序见于明刻稽古堂本,四库全书本及津逮秘书本皆阙。

相贺。三件事首尾完整,层层相扣,从整体上看,《剧谈录》本条应是记叙白敏中生平事迹的一个传记。

《剧谈录》所叙三件事密切相关,第一件事虽然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无直接关系,但从中可以剖析作者的写作态度及特点,为我们判断下文第二事、第三事的真实性做出铺垫。

《剧谈录》“李朱崖知白令公”条首云:

白中书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国器之,许于播绅多所延誉,然而资用不充,无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国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之备,约省阁名士数人,尅日同过其第。时秋暮阴沉,涉旬霖沥。贺拔碁员外求官未遂,将欲出京薄游,与白公同年登第,羸驹就门告别,阍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适对之。贺拔碁遂驻车留书,备述羁游之意。白公览书叹曰:“丈夫处世穷达当有时命,苟不才以侥幸取容,未足为发身之道,岂家蓄美饌,止邀当路豪贵。曩时登第贫交,今日闭关不接,纵使便居荣显<sup>①</sup>,又安得不愧于怀。”遽令仆者命贺拔碁回车,遂以杯盘同费。俄而所约朝贤联骑而至,阍者具陈,贺拔碁从容,无不愧愕而去。翌日于私第谒见,相国询朝士来者为谁?白公对以宾客未至,适有同年出京访别,悯其龙钟委困,不忍弃之,留饮数杯,遂阙祇接,既负吹嘘之际,甘从谴斥之罪。相国称赏逾时,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兹贵达,所以激劝浇薄。”不旬月,[贺拔碁]自使下评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未逾三载便秉钧衡。

材料称“白中书方居郎署”,又称其“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据《白敏中墓志》及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会昌二年九月十三日白敏中自右司员外郎入充学士,所谓“郎署”,应指户部右司员外郎,非为库部郎中。又据《白敏中墓志》,文宗大和初白敏中被义成军节度使李听辟为从事,后入朝,历右拾遗、殿中侍御史,开成四年被邠宁节度使苻澈奏授节度副使,旋被御史中丞高元裕引荐<sup>②</sup>,入充侍御史,寻改右司员外。“居郎署”前,白敏中已仕宦近二十年,历拾遗、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等清望之官,《剧谈录》称其“不为人知”,甚至困窘得连一顿私宴也准备不起,显然不足取信。另外,从常理来看,李德裕身为相位,大

① 便居荣显,四库全书本和津逮秘书本“居”作“无”,此据《广记》改。

② 《白敏中墓志》:“时璩先司徒公职中丞事,前御史有怙削近俗,悉解去,上章请公真为侍御史,寻治留台事,改户部右司员外郎”,高璩父高元裕,开成四年高元裕整顿御史台事详见《旧唐书》卷171《高元裕传》,此不赘。

权独揽，既然器重白敏中，直接擢用即可，何必枉费心机，资助白敏中宴请朝官呢？《剧谈录》不仅严重失实，而且也明显悖于事理，其真实性颇令人生疑。

检诸史籍，除《剧谈录》外，《唐摭言》卷8“友放”亦载此事，但其情节与《剧谈录》有较大出入。《唐摭言》云：

王相起长庆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贺拔碁为交友。碁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知申意，俾敏中与碁绝。前人复约敏中，为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碁果造门，左右给以敏中他适，碁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碁，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可致，奈轻负至交。”相与欢醉，负阳而寝。前人睹之，大怒而去，恳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碁矣。”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撰，书中保留大量唐代科举史料，价值在《剧谈录》之上。检《登科记考》，白敏中长庆二年进士，主考官是礼部侍郎王起，此数者与史皆合。王起性孤直，知人善举，曾四掌天下贡举。王起颇爱惜白敏中的才气，担心他受贺拔碁拖累，遣“亲知”暗中劝诫白敏中。结果白敏中初已应允，最后却与贺拔碁相饮甚欢。这个“亲知”受到冷落，回来后大说白敏中坏话。王起却不为所动，赞叹二人重义轻利的品质，一并录为进士。《唐摭言》本条与《剧谈录》情节极其类似，但是把白敏中、贺拔碁醉饮的时间从二人中进士后移至中举前，故事的另一主角相应的由李德裕换成了主考官王起。当然，白敏中热衷功名，宣、懿朝白敏中两度入相，始终不闻对贺拔碁有何奖擢之举，两人是否为挚交颇值得怀疑。

关于李德裕奖擢白敏中的故事，唐人笔记小说中还有第三个版本。《太平广记》卷265“崔骈”条引《芝田录》云：

李德裕退朝归第，多与亲表裴璟无间破体笑，与李多询以内外新事。李问更有何说，裴曰：“别无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郎官出牧江湖，饮饯邮亭，人客甚众。有仓部白员外未至，崔骈郎中作录事，下四筹。白自以卑秩，人乘凌兢，更不敢固辞，上次酌四大器。白连引三器讫，余一持之，而请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别无事，但何必要到处出脱。’时白踉跄仆于下座，竟不饮而去。坐上有笑者，有缩颈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否？”李闻之大怒，曰：“何由可耐，不斯言必有之乎？”曰：“固然。”又问：“弟知白员外所止否？”璟曰：“是人在某坊某

曲。”李曰：“为某传语白员外，请至宅。”白捧命，又忧恐。比至，李曰：“久欲从容，中外事并，然旬朔不要出人事。”既而白授翰林学士，崔骈汾州刺史，续改洛州刺史，流落外任，不复更游郎署，终鸿胪卿。

唐时饮宴后至一般罚酒三杯，崔骈蔑其官卑，故意多罚一杯。白敏中最后不胜酒力，竟不饮而去，遭到同僚的讥笑。李德裕深恶朝官游宴结党，所以抑塞崔骈，提拔不与之同流的白敏中。《芝田录》本条与《剧谈录》都在解释李德裕为什么举荐白敏中的问题。故事梗概一说白敏中没有喝下同僚权要的罚酒，一说白敏中放弃宴会同僚权要，情节上也有很大的相似度。

唐代小说史官文化影响较深，历史化的特征非常显著<sup>①</sup>。此类小说虽有“补史之阙”的意识，但是为了追求猎奇的效果，时常对人物故事进行编造加工，甚至张冠李戴，与历史事实截然相反。上述三个故事中，《芝田录》讲述了白敏中不饮同僚罚酒，被李德裕奖擢的故事，《唐摭言》讲述了白敏中违背与王起的约定，与贺拔碁醉饮的故事，《剧谈录》则讲述了白敏中违背李德裕的交待，与贺拔碁醉饮的故事。三则故事情节雷同，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特别是《剧谈录》，其情节既言及李德裕，又言及贺拔碁，很可能是糅合其他两则传闻，重新附会而成。长庆初李德裕刚刚步入仕途，为了合乎逻辑，《剧谈录》将故事发生时间后移至李德裕当权的会昌初。并且杜撰出白敏中生活困窘，需李德裕资助等荒诞情节。此类故事貌似补史之阙，实则属于文人的文学创作，切不可信史视之。

白敏中入为翰林学士本出于李德裕举荐，大中初当权时却落井下石，致使李德裕贬死崖州，在政治上是个反复之徒。《剧谈录》开篇即盛赞白敏中“蹈义怀仁，而终始一致”，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在当时官僚集团的朋党之争中，《剧谈录》所录本条故事的编造者无疑是偏向牛党。明了《剧谈录》本条的文学性质，以及作者的创作动机、政治态度，对我们接下来分析白敏中收河湟问题不无裨益。

在塑造白敏中“终始一致”的品质后，《剧谈录》本条开始转入正题，重点记述了白敏中大中初以宰相身份率军大战吐蕃，收复河湟三州七关的丰功伟绩。《剧谈录》云：

大中初，边鄙不宁，土（吐）蕃尤甚，恣其倔强，宣宗欲致讨伐，遂于

<sup>①</sup> 相关研究参阅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第一章《唐五代小说与史官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韩云波《唐五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第四章第一节《关于“史化小说”概念的提出》，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延英殿先问宰臣，公首奏兴师，请为统帅，沿边藩镇兵士数万鼓行而前。时犬戎列阵平川，以生骑数千伏藏山谷。既而得于谍者，遂设奇兵待之。有蕃中首帅，衣绯茸裘，系宝装带，所乘白马骏异无比，锋镝未交，扬鞭出于阵面者数四，频召汉军斗将。白公诫兵士无得应之。俄而驻军，指挥背我师百余步而立。有潞州小将骁勇善射，请快马弯弧而出，连发两矢，皆中其项，跃马而前，抽短剑踏于鞍上，以手扶挟如斗敌之状，蕃将士卒但呼噪助之，于是脱绯裘解金带夺马而还，师旅无不奋勇。既大战沙漠，虏陈（阵）瓦解土崩，乘胜追奔，几及黑山之下。所获驼马辎重不可胜计，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关郡界内在匈奴，自此悉为内地。宣皇初览捷书，云：“我知敏中必殄凶丑。”

大中初，吐蕃政权分崩离析，混战不已，实力严重衰退，《剧谈录》却说“吐蕃恣其倔强”，又朝廷所得不过是陷蕃诸州中的三州而已，《剧谈录》称河湟诸州“自此悉为唐土”，此二者皆与史实不合。白敏中大战吐蕃的主战场，《剧谈录》前云战于平川，似在秦陇山区，后又云战于沙漠，前后相互抵牾，未知孰是。按，黑山，本突厥故地，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一带，唐高宗时曾遣大将裴行俭讨突厥于黑山。吐蕃纵然大败，也当西遁吐蕃本土，也不至溃往黑山。相关记述如此混乱不堪，其事又有几分真实性可言。

据前考，《剧谈录》本条属小说家言，开篇所叙李德裕奖擢白敏中极可能为由《唐摭言》、《芝田录》等书所记故事嫁接而来，这预示其下诸文也不可骤信。通过比对史料，我们发现，《剧谈录》此段白敏中大战吐蕃之事也有所本，其底本即是唐德宗贞元年间西川节度使韦皋大败吐蕃之事。《旧唐书》卷140《韦皋传》：

（贞元十七年）……赞普遣论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都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而来解维州之围。蜀师万人据险设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战。莽热见我师之少，悉众追之。发伏掩击，鼓噪雷骇，蕃兵自溃，生擒论莽热，虏众十万，歼夷者半。

比对白敏中、韦皋二人破吐蕃事，所谓白敏中统兵大战吐蕃，与诸史中韦皋大破吐蕃的记载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德宗贞元末被韦皋所擒的是吐蕃宰相论莽热，而宣宗大中初以河湟三州归唐的吐蕃宰相叫论恐热，二人名字仅一字之差，又都是吐蕃统帅，很容易相互混淆。所谓白敏中大战吐蕃，应是作者将韦皋事迹稍事修改润色，套用到白敏中身上。文中提到的潞州小将，又出现大漠、

黑山等地名,很可能作者为了引人入胜,融入唐前期裴行俭、王知运等与突厥作战的某些传闻。

在叙述完白敏中大败吐蕃之后,《剧谈录》又进一步坐实其事,描述白敏中凯旋后与同列三相进诗贺收河湟。继云:

白公凯旋,与同列宰相进诗云:“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遽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锁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马相植诗云:“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貔武皆神算,开拓乾坤是圣功。四帅(原作师,据四库本,此当为帅)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弢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诗云:“萧关新复万山川,古戍秦原象纬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崔相铉诗云:“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凯歌。右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

马植诗云“七关虽戍”,魏扶诗云“萧关新复”,据《通鉴》,萧关等在大中三年六月至七月始被收复,故白敏中率诸相进诗必在大中三年七月之后。《剧谈录》谓当日在朝者为白敏中、马植、魏扶、崔铉等四相。检两《唐书》,魏扶、崔铉大中三年四月一日入相,马植则在是月得罪罢相,六、七月收河湟捷书至时,朝中仅有白敏中、魏扶、崔铉三相而已。《剧谈录》本条也存有虚构成分,不可能出现四相同时进诗的情形。

收河湟乃一大盛事,宰相进诗虽有其事,但是如前所述,其中多有虚构成分,如果我们对白敏中等人所进诗作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这些诗作内容同此前所谓白敏中领兵大战吐蕃之事直接抵牾。白敏中诗云“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魏扶诗云“戎虏乞降归惠化”,崔铉诗云“远方戎垒尽投戈”,此三相之诗无一例外的都称收复河湟是由于吐蕃的乞降,丝毫没有提及武力收复之事。同时代诗人杜牧亦有诗云:“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sup>①</sup>,可与白敏中等人诗作相照应。

前引白敏中、杜牧诗中皆提及收复三州时宣宗颁布的诏书,杜牧称“今皇帝

<sup>①</sup> 《樊川文集》卷2《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

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似乎曾有用兵之举。《册府》卷170《帝王部·来远门》载:“宣宗大中二(三)年正月,泾原节度康季荣奏吐蕃论恐热以安乐三州及石行(门)七关等归国。诏遣太仆卿陆耽驰往劳焉。仍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邠州宁州节度使张君绪与泾原康季荣各总所部兵镇之。”又司马光《稽古录》卷15云“春,吐蕃相论恐热以秦、原、威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内附。诏泾原帅康季荣、灵武帅朱叔明、邠宁帅张君绪出兵应援,悉定其地。”所谓“征兵”实际上是征发缘边方镇出兵应援镇守。马植诗云“四帅有征无汗马”,“四帅”即泾原、凤翔等四节度使。由此观之,唐军对三州七关的接收,主要是缘边藩镇就近收纳,根本没有设置统帅,又何来白敏中统兵大战吐蕃之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剧谈录》所录四相之诗纯属画蛇添足,非但没有证实白敏中领兵征讨吐蕃,反而成为白敏中没有统兵出讨的有力证据。

《剧谈录》本条之伪谬已昭然若揭,白敏中大战吐蕃本是子虚乌有。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思考。其一,早在武宗会昌时期,吐蕃连年混战,“缘边兵马,颇已抽归”<sup>①</sup>,论恐热又新遭大败,亟需征补军队,必不肯将三州守军白白交给唐军接管或任其被消灭。吐蕃守军应被论恐热调集他处,剩下的主要是日夜盼望官军的汉族遗民,当日即使唐军欲逞武力,也无用武对象。其二,现存诸多文献记载中既无唐军作战进程、破敌数,又无抚恤战死将士家口等善后事宜。军费支出以及粮草转输等都是当时较为严峻的问题,也完全不见相关记载。在史籍文献中丝毫找不出收河湟时曾有战争的迹象。其三,大中三年八月宣宗接收三州七关后,曾颁布《收复河湟德音》,昭告天下。德音有云“今者天地储祥,祖宗垂佑,左衽输款,边垒连降……副玄元不争之文,绝汉武远征之悔。”<sup>②</sup>这是宣宗复河湟的第一手文献,更是唐军和平接收三州七关的直接证据。《新唐书·吐蕃传》云:大中三年九月“凤翔兵与吐蕃战陇州,斩首五百级”,此条记载曾被视为唐军收复河湟中的一次战斗<sup>③</sup>,事实上,陇州是唐军边防重镇,并非陷蕃州。秦州收复后,陇州本不与吐蕃搭界。此次战斗反映了当时朝廷未能很稳固地控制秦州,仍有吐蕃部众趁机深入内地劫掠,这与朝廷武力收取三州的进程并无直接关系。要之,三州七关之地为吐蕃主动归还,当日没有经过大的战斗。

据前考,《剧谈录》本条所记诸事皆为虚枉,牛致功先生等附赞白敏中出讨伐三州七关,主要依据是新近刊布的《白敏中墓志》等石刻史料。虚妄的史实在

① 《李德裕文集校笺》卷7《赐缘边诸镇密诏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② 《唐大诏令集》卷130《收复河湟德音》,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09页。

③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页。

墓志文献中得到“互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牛致功先生对《白敏中墓志》等石刻史料应该存有一定的误解之处。《白敏中墓志》云:

属吐蕃有大丧,大臣争废立事,纪律四坏。有兵众者相起为盗,蔓延波泊,亭障失措。论者以朝廷久无内患,缘镇因循,不事粮甲,若一日问罪,必取笑奴虏。公奉神算,征天下兵,捉险徼利,纳七关与秦、武、渭三州。度陇山还为内地,降男女羊马无多少。理□州,立天雄军,置威州。先是,故老望西郡县,皆冤痛泣血。及是,谓开元风日,可屈指取。<sup>①</sup>

墓志撰者翰林承旨高璩是白敏中“门吏”,故志中极尽虚美奉承之能事,白敏中恰在相位期间收复河湟之地,理所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墓志中有“公奉神算,征天下兵,捉险徼利,纳七关与秦、武、渭三州”等语。《剧谈录》恰又对白敏中领兵收复三州七关的过程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若不先辨明《剧谈录》之伪滥,很容易将二者联系起来,产生《剧谈录》就是墓志“具体化”的错觉。今细审原文,此数语实乃泛泛而谈,并没有明确言及白敏中亲自领兵收复河湟。另外,从墓志文字的详略情况来看,大中五年白敏中以招讨党项都统身份出镇邠宁,在墓志宣宗御安福楼饯行、赐通天带、以神策兵护从等情况,墓志所记尤为详尽。大中三年若白敏中果以宰相出讨吐蕃,此番领兵出讨规格待遇均应比大中五年出讨党项更值得大肆夸耀,当日白敏中以何职名出讨,有何赫赫战果,墓志怎么都避而不提呢?《白敏中墓志》对收三州七关所记过于简略模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已暗示出白敏中当日没有领兵出讨吐蕃之事。

除《白敏中墓志》外,陕西渭南近年又发现了白敏中神道碑。《白敏中墓志》中语焉不详之处,在神道碑中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印证。该碑碑文由宰相毕诚所撰,神道碑叙河湟事云:

天宝末,中原多事,河西、陇右之地尽为吐蕃所据。[宪]宗皇帝志在收复,大业未遂……宣宗皇帝绍元和之□,切于□□□□吐蕃丧□入,不置君长。部落豪右,□□自守……宰相常有复河湟志,慕(按,即桑道茂)有言唐二百年后有中兴,□都复故地。宣宗皇帝应□识公,降(中缺)偶然哉。当□公□皆以儒雅相尚,苟即□无事,□□久远以生事蛮夷□[牢]其位。公以三州□□[关],南北千里,设险阻限夷夏,

<sup>①</sup> 吴纲《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会昌已有藩[盛],界泾州西八千里。常(中缺)之山。虽有□兵□□东下,安可谓之生事矣。向非宁宗之□□之忠,岂惟朝廷失大计,□公亦危矣。

《白敏中神道碑》亡逸较早,《文苑英华》、《唐文粹》等皆不见著录,但是宋时尚可得见。欧阳修《集古录》卷9称“其事与唐书列传多同”,“为毁誉难信,盖如此,故余于碑志惟取其世次官寿乡里为正”,在宋代即不为人所看重。尽管如此,此碑在记收河湟一事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神道碑云“当□公□皆以儒雅相尚,苟即□无事”,前引《白敏中墓志》云:“缘镇因循,不事粮甲,若一日问罪,必取笑奴虏。”二块石刻资料证明在河湟三州七关问题上,宣宗君臣之间曾有严重分歧。宣宗以收复河湟三州为宪宗夙愿,主张收复,而主政的牛党官僚则延续文宗朝牛僧孺拒纳维州的保守思维,“尽以不生边事为本图”<sup>①</sup>,反对收复。白敏中是宣宗拔擢用以操纵群臣的奴仆,自然要服从宣宗旨意,首赞其谋。《白敏中墓志》中语意模糊的“公奉神算”句,在神道碑中表述得非常清楚,所谓“神算”,主要就是指白敏中力排同僚之议,附赞宣宗收复三州七关的计划,在收河湟过程中白敏中的贡献仅此而已。

武宗朝李德裕为相,闻听吐蕃崩溃,密令边将窥探吐蕃守备兵力,秘结河陇遗民,置备边库,积极准备营复河陇诸州,白敏中为相时,吐蕃以三州来降,毫无主动应对之策,仅令缘边藩镇自行收取而已,二相勋业之高下,不言自明。白敏中墓志及神道碑贪天之功,将河湟之功归于白敏中,《剧谈录》复移花接木,炮制出白敏中大战吐蕃收复河湟的赫赫武功。今人援小说证史,难道不应该慎之又慎吗?

<sup>①</sup> 《唐太诏令集》卷130《收复河湟德音》,第709页。